



· 卢鹤绂

## (六)

1976年秋,文化大革命结束,理科大批判组撤销。1975至1985年我被选为上海市物理学会理事长;其后被选为其名誉理事长。由于逐渐对外开放,我受命多次接待科学界上层外宾(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并在市内主持其学术报告。在担任上海市物理学会理事长期间,我积极支持组织“近代物理讨论班”,主持一系列关于粒子理论的讲座,后来不少活跃在粒子物理领域的研究人员就是听了这些讲座产生兴趣的。1978年我应《自然杂志》要求撰写了《蓬勃发展的现代物理学》长篇文章,在其5月创刊号发表。1978年底我还应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要求,撰写了《高能粒子物理学漫谈》一书,1979年11月出版。这本书全面地总结评述了全世界高能物理学研究取得的有实效的成就及其展望。1978年初,我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底我还为《中学物理竞赛电视辅导讲座》编写播讲了《和中学生谈谈怎样学好物理学》,于1979年10月公开发表。

1979年春,华东医院发现我长期患有糖尿病,住院医治。在院中于5月16日突接美国斯瓦尔斯莫尔大学物理系的毕兰纽克教授(即首次论证速度大于光速的粒子不违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两科学家之一)打来电话,告以该大学有一国际性教授席位,系校友康涅尔夫妇捐款设立的,经他推荐,该校校长邀请我为79年至80年度康涅尔尊贵访问教授,嘱我接受这一难得的荣誉,偕夫人前往。因手续复杂,迟至8月才获得教育部批示同意我偕夫人前往讲学一年;迟至11月才发来我二人的公务护照。

1979年11月30日我偕夫人飞离上海,当天到达旧金山,有斯瓦尔斯莫尔大学派专人来接。在旧金山停留两天,加州大学阿尔瓦雷斯及黑穆浩兹两教授设宴欢迎,阿尔瓦雷斯并带我二人到斯坦福大学参观了其大小两座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12月2日晚飞抵费城,由该大学物理系主任曼哥斯多尔夫及毕兰纽克、

巴希欧三教授候迎,接进住所(斯瓦尔斯莫尔镇胡桃巷405号)。在斯校我先后给申请读优等生荣誉文凭的高年级生教两门研究班(席门那尔)课程,1980年上半年教两班量子物理学,1980年下半年教两班经典物理学,每班学生近十人。到斯校不久,巴丁教授打来电话,邀我夏季去他所在地意大利诺大学担任物理学访问教授,我当即答应,偕夫人于6月2日到达俄尔巴那市,在意大利诺大学物理系讲授两个月为各系高材生选修开的速成课,内容包括热力学,分子运动论,电磁理论及狭义相对论,有学生57人。教完后我二人于8月7日返回斯瓦尔斯莫尔。

在斯校教学时期,我曾两度应邀给斯瓦尔斯莫尔镇地区的科学界作过学术专题报告:一次是给希格玛赛科学研究会讲了“论容变粘滞性概念”;另一次是给物理学俱乐部讲了“量子色动力学与量子电动力学的比较”。

在斯校时期,先后有二十多个大学或研究机构电话或来函邀请我偕夫人去访问,讲学或参观。因与斯校繁重教学任务冲突,一部分迟至1981年上半年才能陆续成行。应邀前去访问的机构先后有:宾夕范尼亚大学,德拉威尔大学,富兰克林学院巴托研究所,贝尔电话公司研究所,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杜克大学,布鲁克海文国家研究所,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布林莫尔女子大学,哈佛佛大学,达拉斯德克萨斯大学,芝加哥大学,费米研究院,明尼苏达大学,加省理工学院。1980年我被选为纽约科学院任职会员。

在我们回国之前,不少人对我们说,我二人的光临对斯瓦尔斯莫尔社会作出了很多贡献,在智慧方面和在社交方面都如此。在为我二人举行的送别宴会上,物理系主任向众宣称我教学效果很好,学生们都满意佩服,发现我对物理学近期重大进展理解得很透彻,说我在每次全系专题学术讨论会上,总是最后发言提出令人感兴趣的关键性问题,惹起人们讨论,这使他们感到惊讶。我为能做出这类贡献而感到欣快。1981年7月10日我二人乘上泛美飞机离美返国,11日晚回到上海。这次客居美国共19个月零11天。我在美国期间,接上海九三学社函告我被选为上海九三学社副主任,并按中科院通知我于1980年12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学部委员。

回国后,我曾应邀为上海市物理学会等单位作过访美观感大报告,并撰写出《1979年11月30日至1981年7月10日访美经历及观感》,分七章,共约一万三千字,呈报中央教育部、上海市委统战部及复旦校方。我还应邀偕夫人到外地多处讲学:1982年4月在湘潭大学及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同年5月在江西大

字及九江市科委。1984年4月在江苏常熟科委、杭州浙江物理学会、中山大学；同年5月在华南师范大学，11月在浙江上虞县科委。1985年9月在郑州大学并受聘为郑州大学名誉教授。1986年5月在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泰安师范学院及曲阜师范大学。我还于1983年受聘为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顾问，于1984年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于1986年受聘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管理学研究室高级研究员，于1984年9月我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回国后我还发表了一些演说报告等文章：1982年7月我为《上海物理小报》发刊号撰写了《物理学及其对人类社会实践的作用》一文。1983年我为《数理化园地》撰写了《二十世纪物理学——从电子、光子到 $W^+$ 、 $W^-$ 、 $Z^0$ 粒子》一文。1984年我应《应用科学学报》的邀请，撰写了《技术革命的由来和展望》一文，发表在其二卷二期95至105页上。这篇论文指明历次技术革命同物理学研究成就之间的关系。1984年10月我在全国中学物理教学改革学术讨论会上讲了《从新技术革命谈中学物理教学改革》，随后在《物理通报》上发表。

为便利参加市内政治活动，1984年4月我夫妇二人迁入市内静安区江宁路83弄4号4楼2室新房居住。因住房只有三间，永亮一家三口留住由复旦安排的第二宿舍，永芳一家三口由交大配给的宿舍居住。我应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要求，撰写了《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一书。这本书对哥本哈根学派关于量子论的观点、言论和态度如实地作出实质性总结，供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进一步研究，已于1984年12月出版。我还应《自然科学年鉴》的要求，撰写了《再释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正统理论”》，已发表在1989年《自然科学年鉴》2.1至2.7页上，此文是评论量子力学解释的最近突破性进展。

我先后在复旦大学指导了硕士生两名，一名刘浚在量子论基础理论方面；一名王匡在高能核理论方面。后又先后指导了博士生两名，一名毕品镇，另一名凌有光，皆在高能核理论方面。同毕品镇联名发表了三篇研究论文：1.关于EMC效应及核的夸克胶子模型(1985)；2.中子结构函数及核效应(1986)；3.德莱耳一阄过程中的核效应(1988)。我目前研究工作一方面仍在探索夸克胶子学说对原子核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指导研究宇宙的形成理论等前沿问题，冀能有所突破。我目前仍是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及上海市副主委，中国科学院数学学部委员。1988年10月我从事科学工作50年时，中科院授予我荣誉奖状，江泽民曾在场祝贺。1989年11月中科院授予我中国科学院荣誉章。《中国科学院院刊》1990年第2期162至

164页载有《不知疲倦的探索者——卢鹤绂》一文，对我的所作所为给予了较全面的评价。该文的主要部分也已发表在1989年12月24日的《科技日报》上。

## (七)

1987年12月底我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出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会议时，因控制饮食不力，血糖上升，脑血栓形成中风(下半夜左小腿抽筋剧痛)，其后左半身无力，经送至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抢救，住院医治。其后由侄女卢瑜护送回沪，在华东医院住院医治，至春节前出院在家服药医疗。自犯病起，至今已两年有半，左足仍行动不自如，外出需人扶助，据医检断已80%恢复，尚有20%后遗症，仍在服药，冀能好转。我夫人吴润辉也因年老患老年痴呆病已近两年。我二人老景，叹今昔之不同，相依为命耳。天津家早于50年代初将原址卖掉，迁入今址(贵州路吉安别墅1号)。所幸老母健在，已98岁，由三妹在天津家中侍奉，我感放心。我每年至少一次趁去京开政协会之便回天津探母省亲。先父骨灰盒已于去年安葬在天津南郊南马集天津陵园中。

我的长子卢永强196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二系。文革初期他同吴嘉静结婚，生下孙女卢嘉。后因永强被分配到江西宜春工作，而吴嘉静则留在上海，夫妻分居多年，导致不和，已在美国离婚。永强于1981年3月去美国，目前他在美国休士顿大学物理系任职，又与黄灿琴结婚。卢嘉现在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电机及物理。二子卢永亮在文革期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同马开桂结婚，生下大孙子卢晓。永亮夫妇现在在上海加拿大福特贸易公司任职，卢晓在复旦附中攻读。三子卢永芳中学毕业后被分配下乡，在横沙岛插队落户九年半后才考上上海师范学院生物系，毕业后曾在新群中学任教，经朋友介绍同朱为民结婚，生下小孙子卢科士。永芳于1984年12月去美国，目前他在美国南方德克萨斯大学求学，卢科士在福州由其外婆抚养。四子卢永江1958年6月出生在上海，二十岁时由于车祸去世。我无女儿是一大憾事。

1990年7月14日完稿于上海

## 编后记：

卢鹤绂先生抱病所写的《往事回忆》一文，现已全部刊出。本刊编辑部已陆续收到读者来信，转答他们对卢老的感激之情，并希望继续办好《物理学家回忆录》栏目。为此，本刊从下期开始，连载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先生的回忆录，敬请读者注意。